



利益算计  
权力斗争

从甲午海战到辛亥革命,中国社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:民众普遍失去信仰,社会风气江河日下,利益集团垄断资源,官场腐败已达极点。

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密集变革,在几乎尝试了当时所能进行的变革方式后,依然无法扭转大清急转直下的国运。变革陷入了无尽的利益算计和权力斗争的困境中。

那个年代的人其实是很少有机会出国的,但有一个人例外。

01

袁世凯做幕僚

1859年,常年征战在外的河南籍将领袁甲三给老家写了一封信,报告他率领的军队打败了北方农民起义军(捻军)即将凯旋的消息。家里人接到信的这一天,家族中的一名男婴出生了。

有人衔着石头出生(贾宝玉),有人干脆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(孙悟空),但这个孩子就像上天派来的一位作战捷报的使者,于是大家都很高兴,认为这个男孩子将来会很简单。从现在看这其实只是一种巧合,但是对于袁家人来说这是个好兆头。

这个男孩子是袁甲三亲哥哥的孙子,也就是袁甲三的侄孙,家谱排名“世”字辈,家族人就借这个吉兆为他取名“凯”。

没多久,袁世凯就被过继到他叔叔袁保庆家做儿子。这个袁保庆曾是袁甲三的一名大将,退伍后担任江宁盐法道(副部级高官),掌管南京地区食盐的生产和销售。做官之余,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监督小袁好好读书,以便将来走科举正途,考取功名,对得起他出生时的那个好兆头。

可惜袁世凯似乎天生就不是块学习文化知识的料,他曾鼓起勇气参加了两次科举考试,而且是最基本的乡试,结果名落孙山。

袁世凯很懊恼,他把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找出来一把火烧了。他边烧边说:“我今后要立志去当兵打仗,弃文

从武!”

这时候他的养父已经去世了,于是他从他上海去山东投奔了吴长庆。吴长庆是袁保庆生前的结拜兄弟,吴长庆收留了袁世凯,让他在自己身边做了一个军队里的参谋(幕僚)。这一年是1881年,袁世凯已经22岁了。

职场新人袁世凯很快要出一趟远门,而且很远,是去朝鲜。

在明朝,朝鲜是大明帝国的藩属国,天聪元年皇太极对明作战失败,由于缺少银两就先易后难,派大将阿敏攻下了朝鲜(打朝鲜不用攻山海关),从此朝鲜成为八旗军的后勤供应基地,虽然可能不管饱,但人随随便拿。就这样,八旗军一边流着鼻血,一边杀敌人,一路杀进了山海关。大清国建立后,朝鲜沦为大清国的藩属国(虽然他们一直很想念明朝)。

所谓藩属国,有点类似于被老大保护的老二的意思。朝鲜只有国王没有皇帝,因为他们的皇帝就是大清皇帝,使用的年号也是大清的年号。而朝鲜国王在级别上只相当于大清国的亲王。由于这个原因,朝鲜国王的王宫和老百姓的民居都必须建得比大清国的矮小。

朝鲜这个国家一直比较穷(跟当年皇太极抢得太狠有关系),但当时他们的一品大员出门也是有车的,不过是一种十分简便的车——独轮车。

对于朝鲜来说,穷是因为大清朝太强大,东北又是清朝的“龙兴之地”,大清国从来就不允许朝鲜拥有大规模武装威胁到其龙脉的安全。

穷则思变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。事实证明朝鲜这个“小弟”当得极不安稳。后来他们发现另一个邻居——日本渐渐有了新老大的风范,而日本也一直注意培养在朝鲜的势力,比如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(《江华条约》)就是跟日本签的,于是朝鲜朝廷内部迅速分化成了两派。

一派比较守旧,坚持亲近天朝——大清国,认为永远跟着大哥走,永远有饭吃,他们因此被称作事大党(以小事大——《孟子》),也就是实际上的亲清派;另一派偷偷摸摸接受日本人给的好处,认为跟着这个大哥混不仅有饭吃,说不定还能喝上紫菜蛋花汤,他们自认为比较开化,因此叫作开化党(亲日派)。

事大党和开化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,属于见面问候你,转身就飞起一脚的那种,所以他们当时是带着板砖去上班的(有史料记录),他们在王宫里一言不合就开始拍砖,抄家伙打破头的事情每隔两三年就要来一次。在袁世凯找到工作的第二年(1882年),朝鲜事大党和开化党的矛盾又激化了。

(摘自《大清灭亡启示录(1894-1911)》作者 黄治军)

01

我与梁思成(一)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  
品五味人生

喝下这杯苦酒

北京解放不久,我收到父母辗转从香港寄来的信,父母对我一个人留在北平很不放心,他们觉得既然我已和程应铨有了婚约,我们应尽快结婚,以免他们挂念。我按照父母的意思和程应铨结了婚。

1951年,我和程应铨有了孩子,渐渐地我陷入家务事中,我感到十分矛

盾。我不愿这样生活下去,于是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。不久我患了肺结核,组织上为了照顾我,1953年,我被调到清华大学工作,被分配在建筑系《中国建筑史》编纂小组绘图,建筑史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。

梁先生有时来看我画图,他总能指出我的缺点。一次我在图上注字时离屋脊太近了,他看了后说:“注意要拉开一定的距离,否则看上去好像屋脊上落了一排乌鸦。”说到这里,他淘气地对我眨了一下眼睛。没想到1955年以后我被调到系里做秘书工作,1957年以后又被调去做资料工作,从此离开了喜爱的古建筑专业。

1958年,程应铨在整风运动中犯了“错误”,在给他作结论时,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: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,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。虽然我不明白这算什么罪行,有多么严重,但那时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。

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。最后我决定离开他,独自喝下这杯苦酒。

一封求婚信

1959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豪华的建

筑了,作为建筑学的资料室,我认为应当拥有这些新建筑的照片资料,但当时我们系里没有力量进行收集和拍摄工作。我知道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了大量新建筑的照片,但是他们不对外提供,我灵机一动去找梁先生帮忙。

梁先生听我说明来意后,很高兴地给北京建筑设计院沈勃院长写了一封信,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,尽管去找他。拿到这封信后,很快就得到了这批图片,还在系里办了十大工程图片展览。

有一天,我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,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。我爽快地答应了,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。过了好几个月,一天,泗妹有事要请教梁先生,她要我陪她前往。在他们谈问题时,我想起吴良镛要我帮梁先生整理资料的事,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,没想到他表示非常欢迎。

于是,每隔一个晚上我就去为梁思成整理一次资料。但是我有点后悔,因为资料并不多,大部分是些信件。有些信需要答复,由他口授,我写简单的回信,有的信要转给有关单位去处理。我感到工作很枯燥,我们交谈不多。过去在梁家是以林徽因为中心的,他自然说话不多,现在他仍然说话不多,但很亲切。渐渐地我和他之

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,朋友关系渐渐增进了。

有一天,别人的一封求婚信彻底改变了我和梁思成的关系。

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,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,说她在出席人大会议时见到了梁思成,十分仰慕他,并关心他的生活。她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,便提出要同梁思成结为伴侣。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。这么有趣的事,对我来说还是平生头一次遇见。我抓过一张纸写上:

亲爱的××:

接君来信激动万分。请速于×日抵京,吾亲往北京站迎接,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,右手挥动红色手帕,使吾不致认错也。

×月×日

我强忍着笑,轻轻地走到梁先生跟前,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:“您看这样回信可以吗?您签个字吧!”

梁思成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,但立刻就看出我是在恶作剧,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后,我们相对大笑起来。

他后来和我谈起,自从林徽因去世后,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活,还有些人要给他找个老伴,但他都没有答应。

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

(林洙)

(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)